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 ·

#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逻辑与进路

——基于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与研究

蒲清平，向 往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维逻辑来考察，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对新质生产力构成阻碍的生产关系和体制机制弊端，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新质生产力的解放和跃升开辟道路，是科学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回应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诉求的必然选择，但是，现存的协作机制、人才机制、市场体系、分配机制和开放机制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使新质生产力面临较大的前进摩擦力。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举国体制，积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能级”核心动能；优化人才机制，巩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素质”人才支撑；升级市场体系，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改进分配机制，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品质”社会基础；更新开放机制，争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水平”外部条件。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1；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4)09-0003-15

##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对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

收稿日期：2024-07-26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24SKCS021）

作者简介：蒲清平（1969-），男，四川南部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E-mail: puqingping@163.com

向 往（1994-），女，四川资中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E-mail: iamxiangwang@163.com

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sup>[1]</sup>。《决定》着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要求<sup>[2]</sup>，强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改造不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由此便产生了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是“何以必要”的问题，即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什么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二是“何为重点”的问题，即哪些生产关系不适应并束缚了新质生产力，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直面的短板和重点对象？三是“如何实现”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文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紧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为线索，探究、分析和厘清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进路，以期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夯实学理基础。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提出与深化，新质生产力成为学界焦点，相关研究热度与日俱增。学者们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内涵特征、价值意蕴和发展路径等方面展开研究。其一，出场逻辑研究。学者们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层次入手研究出场逻辑。一是理论逻辑，程恩富和陈健<sup>[3]</sup>认为需要结合新时代新特点进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戴翔<sup>[4]</sup>认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质生产力出场的理论基础。二是历史逻辑，李政和廖晓东<sup>[5]</sup>、魏崇辉<sup>[6]</sup>、蒲清平和黄媛媛<sup>[7]</sup>分别基于人类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史和科技创新史，提出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具有历史必然性。三是现实逻辑，张林和蒲清平<sup>[8]</sup>、曾立和谢鹏俊<sup>[9]</sup>、高帆<sup>[10]</sup>提出“内驱说”，认为生产要素与产业的变革催生了新质生产力；周文和何雨晴<sup>[11]</sup>提出“外驱说”，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二，内涵特征研究。一是基本内涵，学者们从多样化视角对其进行解读。苏玺鉴和孙久文<sup>[12]</sup>立足新旧对比，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质态升级；蒲清平和向往<sup>[13]</sup>根据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变迁情况诠释新质生产力；钟茂初<sup>[14]</sup>从动力出发，强调新质生产力由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二是鲜明特征，胡莹<sup>[15]</sup>、李晓华<sup>[16]</sup>归纳出新质生产力的“三高”特征。其三，价值意蕴研究。一是“服务整体发展说”，赵振华<sup>[17]</sup>、徐政等<sup>[18]</sup>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二是“服务协调发展说”，王琴梅和杨军鸽<sup>[19]</sup>、张震宇<sup>[20]</sup>认为新质生产力对产业和城乡协调发展意义重大。三是“服务国际竞争说”，柳学信等<sup>[21]</sup>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促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主动权。其四，发展路径研究。学者们在观照新质生产力的本体，以及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形成两套方案。一是“建强本体说”，任保平<sup>[22]</sup>、贾康<sup>[23]</sup>、张辉和唐琦<sup>[24]</sup>着眼于新质生产力的动能来源、主要载体和根本创造者，认为要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现代化和培养高素质人才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改革促进说”，李军鹏<sup>[25]</sup>、逢锦聚<sup>[26]</sup>、张占斌<sup>[27]</sup>、蒲清平和马睿<sup>[28]</sup>认为，新质生产力要求变革那些只适应传统生产力的落后生产关系，为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下，深化经济、科技、教育和人才等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虽然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学者强调要建立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但是，现有研究未能澄清生产关系的哪些弊端阻碍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因而未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 二、何以必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逻辑

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万事万物均有生发的动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如何使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不断涌现的时代之问亟须科学回应。从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审视，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不能忽略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关联与相互作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保障的必然选择。

### （一）理论逻辑：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通过回溯、观察和研究人类的劳动生产与社会生活过程，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恩格斯早期在英国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肇始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化进程“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sup>[29] 105</sup>。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sup>[29] 533</sup>。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关系，同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生产力具有变动不居性，“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sup>[30]</sup>，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将诱发经济基础的变化，使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发生变革，引致社会形态的升级与更迭。诚然，在总体趋势上，生产力控制着生产关系的运行轨道，并以此为介质，传导对社会形态的整体性形塑力量，但是，二者之间其实“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sup>[31]</sup>。生产关系通常无法时刻与生产力保持完全同步，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存的生产关系将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脱节，并转变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只有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应生产力现状的新型生产关系，使二者在“基本适合—不适合—基本适合”的动态交互中，实现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跃升，才能够确保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新动能。新质生产力是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要求。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自觉把握。

### （二）历史逻辑：借鉴中国共产党以变革发展生产力的历史经验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指导下，变革旧的、不合时宜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清晰主题。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已遭到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丧失发展自决权，由帝国主义培养的买办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势力勾结，持续加大对人民的系统性剥削，不断破坏社会生产秩序。毛泽东同志指出，“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sup>[32]</sup>。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顽强斗争，逐步瓦解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中国的统治；在农村地区发动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激发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实行了彻底改造，为解放生产力提供了根本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恢复国民经济和工业化被提上日程，资本主义属性的工商业，以及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手工业等所有制和生产组织形式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化解工业化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使用合作化道路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集体化重构，建立起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并且，为使资源集中统一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国自“一五”计划正式实施后，逐渐形成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定时期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经历探索波折，但是，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总体上对农业、工业和国防等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时期，由于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计划经济体制红利消退，迟滞性、低效性等缺陷暴露，叠加其他体制的不健全问题，中国生产力发展受阻、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重要标准，一方面，领导对内改革。逐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完善所有制结构，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

化科技、财税等体制。另一方面，领导对外开放。使中国得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谋求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由此显著提升。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把握社会生产力的演进方向和发展要求，提出“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sup>[33]</sup>。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围绕经济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科技体制、党和国家机构、对外开放保障体系等方面开展系统性深化改革，以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促成了生产方式的蜕变，保障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升维。2013—2023年，在规模上，中国GDP由592 963亿元飞跃至1 260 582亿元，人均GDP由43 497元增长至89 358元；在增速上，中国GDP年均增速保持在6%以上，即使在三年新冠疫情期间依然稳定在4.5%以上；在能级上，中国高技术产业规模、能力与效益稳健提升；在贡献上，2023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2%。历史证实，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力的制胜法宝。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必须吸取成功经验，实施全面深化改革，使生产关系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三）现实逻辑：打通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堵点卡点的应然之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sup>[34]</sup>发展是硬道理，厘清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从生产力的角度审视高质量发展命题，强调高质量发展要依靠新质生产力。其一，就经济发展维度而言，近年来，全球发展版图呈现“西降东升”态势，在霸权思想和意识形态偏见的驱动下，部分西方国家畏惧和遏制中国的发展，通过“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行径加强对中国的阻遏，这种外部干扰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不利因素交织堆叠，导致中国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身处困局，创新是破局之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建设新兴产业集群，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制造新需求、刺激新消费、开拓新市场，从而拉动内需，塑造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二，就社会发展维度而言，新质生产力负载着先进而强大的社会财富创造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社会财富量与质的双重提高，为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三，就生态文明发展维度而言，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在科技创新赋能下进行绿色化跃升的产物，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有助于从设备更新、工艺改进、流程优化等方面托举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降低能耗与污染，又有助于壮大清洁能源、清洁生产和环境修复等产业，维护生态安全。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作为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而展现出的新质态，新质生产力呼唤新型生产关系。然而，部分现存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构成阻碍，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调整与革新生产关系，打通堵点卡点，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够使新质生产力获得解放、生机勃勃，为推动中国各领域高质量发展输送能量。

## 三、何为重点：以全面深化改革补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sup>[35]</sup>从问题导向来看，扫描、发现和厘清向新质生产力施加显著阻力的生产关系和体制机制弊端，明确短板，从而抓住关键问题和战略重点，有利于提升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确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面临的短板在于协作机制、人才机制、市场体系、分配机制和开放机制不健全。

### （一）协作机制不健全的短板

“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

产生的。”<sup>[36]</sup><sup>382</sup>生产力的变迁具有社会属性，主要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协作，而非抽象的原子化行为。追溯人类发展历史，生产力水平大致经历了“人被支配”与“人去创造”两个阶段，而人类击退受动性、增强能动性的关键转折点就在于人类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总结道，“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sup>[36]</sup><sup>698</sup>，邓小平同志更是将科学技术定义为“第一生产力”<sup>[37]</sup>。新质生产力表征着生产力发生全方位、根本性质变的高阶样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而驱动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通常是原创性、颠覆性的。这种科技创新旨在拓展人类认知与能力边界，充满挑战性与未知性，不处于任何单一主体的经验域之内，需要以动员各方力量、提升组织强度的协作为基础，不过，就目前而言，协作机制还不够完善，影响了协作质量。

第一，创新资源配置协作结构还需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是科技创新的先行工作，完善创新资源配置是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之举。市场和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力量，角色和功能各异。与政府相比，市场具有效率优势，能够通过敏锐捕捉和把握价格与供求等要素的波动，实现创新资源的高效精准配置，快速激活科技创新活动，而在部分困难系数高、风控难度大、投入战线长、收益预期不明朗的科技创新领域，则无法单独依靠市场施效。政府能够立足统筹兼顾的宏观角度，通过制定和落实行政规章与政策计划，引导和规范市场的创新资源配置行为，矫正并弥补市场的失范与失灵，保障创新资源的合理调度与投放。市场与政府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二者在协作中提升创新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与科学性，才能为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升级新质生产力做好铺垫。在实际操作中，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容易陷入处理不当的窘境，政府“越位”或“错位”时有发生，不利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第二，多元主体跨界协作平台建设还需强化。科技创新是主体的对象性活动。政府作为行政机关，“不仅资助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风险最高的研究项目，通常还直接推进突破性、开拓性最强的创新”<sup>[38]</sup>；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面向产业需求，拥有投身科技创新并使之落脚于生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内生自觉；高校与科研院所是创新资源和人才的集聚地，是发现客观规律、刷新知识体系、创立科学理论、催生高端技术的策源地，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原理支点。各类科技创新主体各具比较优势，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需要汇集多元主体，凝聚巨大合力。与此同时，从科技发展现状来看，对先进方法、知识与技术进行系统性交叉耦合，已经成为取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途径。因此，为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撬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实现多元主体的跨专业、跨学科、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跨地区协作。当前，用以容纳和组织多元主体跨界协作的阵地仍不够完备，科技创新还未完全脱离分散性、碎片化状态，不利于提高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实效性。

第三，多元主体跨界协作制度体系还需健全。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面临极大的实施困难，需要较长的实施周期，客观上要求多元主体跨界协作并得到科学规划的引导，遵循长期主义的道路。根据实践可知，“制度带有全局性、稳定性，是管根本、管长远的”<sup>[39]</sup>，加强制度建设是明确工作任务、保障工作推进、取得工作成绩的必要前提，但当前围绕多元主体跨界协作的制度体系安排并不成熟，不利于提升多元主体跨界协作的组织性、规范性、战斗性和连贯性，降低了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前进速度。

## （二）人才机制不健全的短板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sup>[40]</sup>生产力并不是自然界演化的结果，人是孕育和发展生产力的自觉性主体、能动性力量和决定性因素。随着社会进步，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才成为发展的第一资源，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依靠人才，但当前的人才机制尚不健全，抑制了人才在发展新质

生产力过程中的作用。

第一，人才培养滞后。人才培养是指依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目标，结合人才现状与特点，运用一定的内容与方法教育塑造人才。新质生产力作为在动能来源、内部构成、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等方面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高端生产力\*\*，对人才提出的要求具有特殊性与新颖性。然而，当前的人才培养工作还没有彻底摆脱沿革传统、遵循旧式的滞后性，未能及时聚焦和顺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作出科学调整，导致人才之“供”与新质生产力之“需”之间产生“错位”与“脱节”，降低了人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能。

第二，人才管理失当。人才管理是指根据规章制度，对人才进行岗位安排、职责界定、任务部署、考核评价，使人才发挥才智，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毛泽东同志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sup>[41]</sup>组织管理生态的性状是影响人才表现的关键变量，观瞻当下，“家长控制式”“权威统治式”“剥削压榨式”等非平等式管理形态未被根除，人才在创造性活动中的主体性角色和主人翁地位没有得到高度认同与尊重，压抑了人才以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性。

第三，人才流动受限。人才自由流动是指人才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根据自身的发展意愿、利益诉求和综合素质，在不同岗位、组织、领域、部门和地区之间进行自主性流动和转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多元知识、技术与理念相互碰撞、彼此嵌入、集合迭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离不开人才的自由流动，以及由此诱发的人才能力外溢与叠加，但是，当前部分制度与规则对人才自由流动施加严格管控，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借助人才自由流动的契机而获得攀升动力。

### （三）市场体系不健全的短板

从中国多年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程来看，认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为中国生产力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强大保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赖于完善的市场体系的支持，但是，客观而言，当前的市场体系中还存在诸多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短板。

第一，市场全国统一性不足。新质生产力作为由掌握先进知识与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呈现数智化特性的“新介质”劳动资料，以及以虚拟数据为重要代表的“新料质”劳动对象，在盘活资金与管理的情况下，共同塑造的高级生产力，无法生成于任何孤立的生产要素，只能脱胎于众多先进生产要素的组织化过程，为此，必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sup>[2]</sup>。长期以来，在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影响下，中国不同地区形成了具有异质性的市场规则体系与基础设施体系，各地区还未充分实现市场规则与基础设施的协调配合，市场分割性较强，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不利于分布于各地的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高效顺畅地涌流、汇集与融合。

第二，市场不公平竞争尚存。《决定》将市场环境定位为“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sup>[2]</sup>，说明了公平与活力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每一个生产经营主体均享有地位与机会的平等性，为不断凭借高品质产品与服务赢得市场竞争，达到盈利目的，各类生产经营主体通常会根据市场动态需求，积极推动设备提质、技术迭代、工艺流程变革和管理模式改良，以实现产品与服务创新，这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当前，由行政干预等因素诱发的市场不公平竞争现象依然存在，不公正待遇会损害部分生产经营主体的创新权益与意愿，导致用以涵养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氛围无法形成。

第三，市场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驱动力不足。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以吸收内化科技创新成果为重要发展渠道的高端产业的集合，包括经过改造升级的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是孕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母体，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sup>[42]</sup>。当前，市场作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助

推器和主阵地，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专业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投融资机制及技术交易平台等发育不良，难以持续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和产业的“惊险一跃”，不利于打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进化，从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 （四）分配机制不健全的短板

新质生产力是社会运行的产物与构件，内嵌于社会系统之中，与社会成员紧密联系、相互沟通，受到社会成员的长期性、立体式影响。“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43]</sup>，分配作为主导利益流向、决定利益归属、控制利益布局的手段，影响社会成员的思想倾向和行为取向，从而影响社会成员对新质生产力施加作用的性质与方式。从现实情况来看，分配机制的短板还未补齐，难以有效驱动社会成员共同发挥保障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向作用。

第一，激励性分配松弛。科技创新人才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与实践者，运用分配方式激励科技创新人才的科技创新热情，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一项规模较大的实证调研分析表明，当前科技创新人才的收入分配没有与贡献相呼应，存在分配与贡献割裂和脱钩的现象，导致部分科技创新人才无法获得同自己的工作贡献相匹配的收入，同时技术入股、股权分红等长效奖励也占比偏低<sup>[44]</sup>。这种“多劳而不多得”的分配形态会削弱科技创新人才推动科技创新的效能感、积极性与主动性，影响科技创新的效率与效果，不利于积累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势能。

第二，行业性分配分化。一般而言，新质生产力主要对应以开发、升级和应用高新技术和产品为主业的行业。其他部分生产性和服务性行业虽然并不直接涉足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生长圈，但也能够在纵横交错的社会分工的牵引下，对新质生产力行业产生催化作用。只有各个行业均健康蓬勃发展，才能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多重发展动力。2023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统计数据显示<sup>[45]</sup>，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平均工资最高，为223 088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年平均工资最低，为54 516元，最高值超过最低值3倍。这组数据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新质生产力行业与其他生产性和服务性行业的收入差距较大，而行业间收入的过度分化可能会强化低收入行业劳动者的相对被剥夺感，不利于激发各个行业的活力，对由各个行业共同构筑起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良好生态造成了阻碍。

第三，保障性分配不足。在透过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对社会成员进行考察时，社会成员可以被划分为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掌握着先进的专业知识与技术，主要从事创造性劳动，与之相对，低技能劳动者主要从事重复性、程序性劳动。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被革命性重塑，社会生产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程度提高和广泛普及会挤压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空间，或将在一定时期内导致较多低技能劳动者陷入技术性失业。然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低技能劳动者的负面情绪可能在技术性失业带来的重压且社会保障支撑力不足的生活境况下被放大与激化，不利于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 （五）开放机制不健全的短板

“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sup>[29] 560</sup>历史由彼此封闭的民族历史走向相互开放的世界历史，为生产力搭建了通往新纪元的阶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sup>[46]</sup>发展新质生产力绝对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坚持开放。一方面，开放有助于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金、人才、先进技术和成熟管理经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多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开放使生产经营主体面向前途广阔而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为开辟和抢占世界市场，生产经营主体将对焦国际高标准提升创新力度，增强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生产和提供具有高科技含量、高绿色含量的产品和服务的内生动力，但是，当前的开放机制尚存在一些弊病，导致以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链条缺乏坚固性。

第一，开放类型转轨乏力。开放类型主要可划分为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商

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是使商品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按照价值、供求、竞争等市场规律进行转移与配置，制度型开放是在规则、规制、法律、标准等制度性层面对接和融入国际先进规则。制度型开放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影响着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能够对一个国家从开放中获益的情况产生持久的结构性影响，因此，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转向制度型开放。然而，中国当前的制度型开放水平较低。从规则主导权来看，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介入国际规则制定、修订和解释的主导优势并不明显，无法从根本上构建起全面保障中国发展利益的国际规则环境，无法有效制约部分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西方国家通过操控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对中国实行多重封锁打压；从规则适配性来看，中国部分现行法律法规、规则规制和标准体系等未能同国际通行规则对标与衔接，规则间的互不通约性不利于中国同其他国家开展高质量合作，这些因制度型开放不足而引起的问题限制了新质生产力获得全球有益资源的滋养。

第二，开放格局还不平衡。在地理区位、政策规定、文化传统和历史惯性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形成了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开放程度较高、中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开放程度较低的空间格局。以2022年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地区和省份分布情况为例<sup>[47]</sup>，东、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分别为86.9%、7.3%、5.8%；江苏、广东、上海、山东、浙江五个东部沿海省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高达1245.2亿美元，占全国的65.8%。各地开放条件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各地借助外部利好发展新质生产力条件的不平衡性，对中国实现新质生产力总体水平的跃升造成了一定困难。

第三，开放平台口径狭窄。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作为中国落实开放的发力点与承载物，直接影响着开放的能效。开放平台目前针对金融、数字贸易和教育文化等领域设置了较高的服务和要素跨境壁垒，部分服务和要素的自由化便利化流转受到抑制，降低了中国通过内外联动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效率。

#### 四、如何实现：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进路

“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sup>[48]</sup>新质生产力需要新型生产关系，当前的协作机制、人才机制、市场体系、分配机制和开放机制等以体制机制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还不够健全，无法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新质生产力形成了束缚，客观上要求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于现象中把握本质，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和必须贯彻的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sup>[2]</sup>。只有在实践中贯彻“六个必须坚持”原则，围绕上述生产关系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举国体制、优化人才机制、升级市场体系、改进分配机制、更新开放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够有力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 （一）完善举国体制，积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能级”核心动能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抓住了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就抓住了新质生产力实现飞跃式进阶的命脉。现行的协作机制对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保障力度不足，必须加以变革。与依托行政指令式的传统举国体制不同，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一种全新的科技创新协作模式与机制，致力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来自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科技创新主体进行有机结合与跨界协同，凝合为目标清晰、紧密团结、运行高效的坚强组织，有助于集举国之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保障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攻关。要实现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带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就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强化科技创新协作效力。

第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善科技创新协作整体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论及新型举国体制时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化企业技

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激发创新主体活力”<sup>[49]</sup>。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现更高层次科技创新协作的重要基础，而推动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转变，是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宏观上就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提出了“抓战略、抓规划、抓政策、抓服务”的转变要求<sup>[50]</sup>。一要确保政府抓战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抓住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这一圆心，密切追踪和科学分析国内与国际形势，从顶层设计上厘清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重点领域，进而明确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标注科技创新协作应当瞄准的战略方向。二要确保政府抓规划，统筹科技创新协作的一般规律、现实条件和战略方向，研判科技创新协作的未来趋势，据此作出增益科技创新协作的前瞻性规划与部署。三要确保政府抓政策，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出台鼓励和便利开展科技创新协作的政策，以政策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强化科技创新协作的积极性、长效性与常态化。四要确保政府抓服务，既“不越位”，紧扣“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的主线<sup>[2]</sup>，保证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升市场监管与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又“不缺位”“不错位”，依据科技创新客观需求，动态调整改良科技服务体系，以精准化科技服务为科技创新协作保驾护航。

第二，加强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筑牢科技创新协作阵地。科技创新基地是立足国际科技竞争前沿、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阵地，科技创新基地为组织多元科技创新主体开展基础型、应用型、工程型科技创新协作提供多样化辅助支架，进而全面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为依据，锚定承托主体跨界融合、促进资源集约利用、强化科研服务力度、便利成果培育孵化和顺利转化的方向，优化科技创新基地的空间布局、基础设施、治理方式和保障体系，使科技创新基地实现“内涵式”发展，规避低水平重复建设。

第三，加强创新联合体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协作落于实际。作为多元科技创新主体，创新联合体为完成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基于共识与规则，跨界组成利益与行动共同体。创新联合体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人员、知识、信息、技术、数据与设备等创新资源的充分共享、系统整合与优势互补，衍生“1+1>2”的协同效应，打开科技创新的质变跃升通路。要在政府的组织协调下，支持深耕高新技术与产品研发的科技领军企业植根产业基础，把握市场规律，面向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和战略需要，定位关键技术缺口，提炼和分解攻关任务，从政产学研等多部门中筛选适宜的科技创新主体，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要充分发挥制度对创新联合体的引导与规制作用，根据创新联合体的构成主体、任务内容、任务目标，围绕创新联合体的进入退出、内部分工、组织管理、经费使用、绩效考核、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等方面进行制度论证，确保创新联合体的运作有制可依、因制而兴。

## （二）优化人才机制，巩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素质”人才支撑

人才是生产力转化为现实、迁移至高端的“第一推动力”，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与跃升，从根本上依赖人才的科技创新与奋斗实干。只有对人才机制进行优化，推动人才实现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充分发挥创造新质生产力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供应不竭的智慧与力量。

第一，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需要科技创新提供核心动能。科技创新需要高素质人才的推动，高素质人才的成长需要教育引领。另一方面，将科技创新成果引入教育，有利于充实和变革人才的知识技能体系，筑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基石。只有贯通教育、科技、人才，使三者形成能量层层传导渗透的有机整体，才能够确保新质生产力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时刻观察并预判随国际竞争与国内建设形势变化而演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定位新质生产力背后的科技创新重点领域，解构科技创新对人才的学科专业、科学研究方向、知识技能体系、思想行为范式等方面提出的新要求，以此为参照系，及时调整更新学科结构、专业设置、

教材体系、课程体系、培养计划和教育教学手段；要紧密跟进国内外学术界、科技界、产业界的研究动态，及时借助最新科技创新成果改良教育形态、赋能教育实施、提升教育效果，并辅助人才了解掌握最新科技创新成果的内在原理、适用范围和应用逻辑，完善人才培养全过程，使教育链、人才链和创新链达到供需匹配、对接融合，提升对新质生产力的拉动力。

第二，推动人才管理人本化。在法律层面观察和溯源劳资矛盾新变化、新表现与新诱因，建立健全人才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并加大执行力度；在用人单位层面要坚持尊重人才特点、发挥人才优势、支持人才成长的价值导向，改进人才的岗位安排、职责界定、任务部署和考核评价，同时推动组织扁平化、民主化建设，疏通人才参与组织重大决策和进行意见建议反馈的渠道；在社会层面利用全媒体矩阵广泛宣传在一线生产、科研攻关和社会服务中涌现出的典型人才及其主要事迹，营造崇尚人才、爱护人才、渴求人才的社会氛围，从而使人才在劳动创造中的主体性角色和主人翁地位得到确认，强化人才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自觉性与责任感。

第三，推动人才自由流动畅通化。通过科学调研，掌握不同人才、组织、行业、领域、地区的利益平衡点，清除限制人才自由流动的规则性与制度性障碍，为人才自由流动提供信息咨询、法律援助和秩序维护等优质公共服务，保障人才能够通过自由流动，传播扩散并获取吸收前沿性知识、技术与理念，推动知识集成、技术协同、理念整合，进而催生智慧倍增效应，激发和释放更多新质生产力。

第四，推动人才学习终身化、常态化。在大中小学教育中贯彻终身学习理念，综合运用道理规劝、实例讲述、朋辈互助、角色扮演、榜样示范和具身实践等方式，引导人才建立终身学习的意识与习惯。系统化考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人才的普遍成长诉求，与时俱进地完善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推动教育文化类公共产品实现总量扩大、类型增加、质量提升和均衡协调分布，打造全息化、分布式终身学习场景，协助人才持续增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

### （三）升级市场体系，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生产力发生由传统形态向新质形态的能级质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推行与发展。市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场域，只有不断提高为市场体系补齐短板、锻造长板的实施标准和验收标准，推动市场体系进行整体性改良升级，才能够使新质生产力在日臻完备的市场体系的助力下，实现拔节生长。

第一，促进市场全国统一。实现市场的全国统一要坚持“破”“立”“通”“融”并举。一要“破”，动态审查带有地方、行业与部门保护主义色彩，以及崇尚内部小循环的排外性市场规则，在充分考虑社会承受程度的前提下，予以修订或废止，挖除导致市场割据的规则。二要“立”，统筹各地区不同的战略定位、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依托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循序渐进推动各地区实现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市场竞争和市场仲裁等规则的衔接与统一。三要“通”，指导各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评价标准体系的统一性重构，通过积极促成各地区交通运输、仓储物流、能源供应和数字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实现各地区市场的互联互通。四要“融”，“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sup>[2]</sup>，提高城乡经济社会治理、国土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和协同化程度，推动城乡市场融合发展，进而建设具有规则性统一和物理性统一的市场，保障各类先进生产要素能够不受无形壁垒和有形障碍的制约，高效顺畅地流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

第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要确保政府在起草和制定涉及市场准入、招商引资、项目招标、政府采购、财政补贴、产权保护、企业信用评价、生产经营行为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时，严格对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对政策进行全面审查、评估、修改与完善，使政策排除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地域歧视，形成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工具箱。要在市场内部加强反不公平竞争自律监管组织建设，围绕公平竞争进行法治宣传和道德教育，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信息披露平

台，依法曝光通过权钱交易、虚假宣传、商业诋毁、恶意降价等手段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使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的创新热情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被不断释放，以创新巩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根基。

第三，迭代市场服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功能。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彰显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服务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刺激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购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服务的需求，倒逼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主动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专业化能力；要面对科技创新成果趋向多元化、复杂化、尖端化的现实情况，利用校企联合、产教融合等教育模式，培养一大批能够高效准确完成科技创新成果评估、定价、权属转移和产业化等高难度复合型任务的技术经理人；要推进市场化科技股权投资改革，以股权收益吸引社会资本流入，解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融资难问题；要依托大数据、区块链、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打造公开透明、安全可靠、运行有序的全国性技术交易平台，从而以功能齐备的市场托举科技创新成果从试验性建构向产业化应用顺利过渡，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大规模迸发。

#### （四）改进分配机制，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品质”社会基础

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分配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进而影响着新质生产力赖以生存的社会系统。只有紧扣将社会成员汇集为支持和拥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统一战线”，改进与革新分配机制，才能够运用合理的分配手段，引导社会成员团结一致、同向发力，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筑造强不可破、坚不可摧的社会基础。

第一，提高科技创新人才收入。建立体现科技创新贡献率的薪酬体系，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承担科技创新任务的组织单元内进行薪酬体系改革，将科技创新人才的科技创新贡献率作为绩效评价和薪酬计算的核心参考依据，将薪酬与贡献严格挂钩，为实现边际报酬的稳定增长提供可靠保证，使科技创新人才的劳动付出得到应有的认可与回报。建立有助于催生和强化科技创新意愿与行动的福利体系，既要形成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激励体系，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落实技术入股和分红奖励，以及提高税收优惠力度等措施，确保那些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向市场应用的科技创新人才能够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收益；又要形成多元化的待遇提升体系，立足工作与生活多重角度，根据科技创新人才的切身诉求，围绕工作环境改善、进修培训、外出交流、住房安居、医疗康养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给予科技创新人才充分帮助，免除科技创新人才的后顾之忧，提升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与专注度，催动新质生产力乘势升级。

第二，弥合行业间的收入鸿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基于对各个行业经营模式、盈利方式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全面考察，由中央政府酝酿颁布控制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指导性意见，为具体操作提供原则性、根本性引领。按照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的要求，将维护人民利益和凝聚发展新质生产力共识这两方面统一起来，稳步提高生产性和服务性行业一线劳动者的收入，逐渐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激发各个行业劳动者的生产创造热情，使新质生产力在各个行业的蓬勃发展中汲取强大的前进力量。

第三，全面夯实社会保障体系。一要夯实政府主导型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就业优先政策”<sup>[2]</sup>，集聚和委托各领域专家学者组建团队，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就业影响进行深度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动态生成正在或可能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数智化转型而“去人工化”的岗位清单，以反向选择的思维持续改进并落实为低技能劳动者提供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送岗协调服务等支持性政策，竭力防范和治理大规模技术性失业。积极进行制度探索，在评估企业等用人单位在获得税收优惠、享受贷款减息、申请政府补贴和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活动等方面的资格时，提高社保缴纳表现的指标权重，引导用人单位依法为员工按期足额缴纳社保；对未参加社保的自由职业低技能劳动者进行摸底调查、信息宣传和参保帮扶，使低技能劳动者进驻社保网络、得到社保支援。深入一线、扎根基层，依托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定期排查和走访在技术替代下遭遇失业的低技

能劳动者，特别是因受限于文化水平、身体状况或家庭条件而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劳动机会、取得稳定收入的弱势群体，依据低技能劳动者的困难程度与脱困能力，进行分级分类转移支付，守住民生底线。二要夯实公益慈善型社会保障体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志愿服务文化中的公益慈善精神，以文化先进性与社会成员审美偏好的统一为标尺，以调动多重感官体验的先进技术为辅助，综合运用线上线下平台，创作、发布和推广以公益慈善为主题的话剧、动漫、短视频、纪录片和网络游戏等作品，实现公益慈善精神的通俗化叙事、具象化表达和大众化传播，营造浓厚的公益慈善氛围，鼓励社会成员无私奉献、守望相助<sup>[51]</sup>。加强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督、指导和扶持，使公益慈善组织提升专业性、感召力和行动力，带动社会成员依托公益慈善组织，通过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自愿让渡与外向辐射，为他人纾困解难。构筑并完善政府和民间双重保障体系，帮助低技能劳动者在面临技术性失业时增强应对困境的能力，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有序运转，防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遭遇阻滞和抵制。

#### （五）更新开放机制，争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水平”外部条件

开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措施和重要渠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效同开放水平正相关。为使新质生产力获得良好外部条件的补给和助益，在内外双引擎的共同策动下厚植成长优势、实现健康发展，必须更新开放机制，系统性改善中国的开放局面。

第一，推动制度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轨，必须同时依靠由内而外的规则供给和由外向内的规则适应。一要加强由内而外的规则供给，“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sup>[2]</sup>，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倡者和践行者，要发挥对世界的感召作用，着眼数字贸易、新兴科技、新兴产业等新兴领域，综合考量国家发展利益与人类发展利益，通过主动参与和引领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规则优化，向世界供给以促进互利共赢为旨归的规则性公共产品，创造中国在关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兴领域掌握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的先发优势。二要加强由外向内的规则适应，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参考《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美墨加协定》（USMCA）等国际高标准通行经贸规则的条款与内容，完善中国的涉外法律法规、外商监管模式和质量认证标准等制度规则体系，促进制度规则的内外衔接，提升融入全球的顺畅性和有效性，为中国借助全球有益力量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提供长期保证。

第二，推动平衡型开放。一要优化各地区开放分工，根据各地区在地理区位、经济条件、文化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差异化部署各地区的开放功能、开放任务、开放内容、开放模式，形成多样化开放赛道，实现错位开放，防止部分地区由于在同质化开放中遭遇比较优势的遮蔽而成为“开放洼地”。二要提升各地区开放质效，在继续全面巩固和扩大东部沿海地区开放优势的同时，引导中西部、东北地区和内陆地区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教研条件和产业基础，有序承接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东部沿海地区部分产业的梯次转移，因地制宜探索打造特色鲜明、配套合理、链条完整的新兴产业集群；对标联通周边国家，加强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发展，完善升级中西部、东北地区和内陆地区的交通类、能源类和通信类基础设施，从而以产业集群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中西部、东北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开放竞争力与实效性，形成全国齐头并进、多点开花的平衡性、协同性开放格局，使各地区均能够获得依托开放提高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良好机会。

第三，提升开放平台包容性。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开放与安全，根据全球局势嬗变情况，锁定和预测影响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的重大风险因素，审慎谋划安全红线，在此基础上，对金融、数字贸易和教育文化等领域进一步降低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针对服务和要素设置的跨境流动限制和准入门槛，规范边境后措施（Behind-the-Border Measures），增进服务和要素的自由化便利化流动，以确

保新质生产力能够同全球各类优质资源建立有效链接,拓宽发展路径,增强发展动力。

## 五、结 语

无论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来看,还是从中国共产党依靠领导社会革命和改革以发展生产力的历史经验来看,又或是从新质生产力对中国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来看,着眼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点,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使新质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发展,均是具有深刻逻辑必然性的科学选择。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完善举国体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强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加强创新联合体建设,凝聚举国之力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积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能级”核心动能;要优化人才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动人才管理人本化,推动人才自由流动畅通化,推动人才学习终身化、常态化,巩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素质”人才支撑;要升级市场体系,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迭代市场服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功能,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标准”市场体系;要改进分配机制,提高科技创新人才收入,弥合行业间的收入鸿沟,全面夯实社会保障体系,以合理的分配手段引导社会成员汇集为支持和拥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统一战线”,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品质”社会基础;要更新开放机制,推动制度型开放、平衡型开放,提升开放平台包容性,争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水平”外部条件。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3] 程恩富,陈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当代经济研究,2023(12):14-23.
- [4] 戴翔.新质生产力:基于《周易》思想的理解和启示[J].阅江学刊,2024(2):116-125+174.
- [5] 李政,廖晓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46-159.
- [6] 魏崇辉.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理论与改革,2023(6):25-38.
- [7] 蒲清平,黄媛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6):1-11.
- [8] 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37-148.
- [9] 曾立,谢鹏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J].经济纵横,2023(12):29-37.
- [10]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27-145.
- [11] 周文,何雨晴.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J].财经问题研究,2024(4):3-15.
- [12] 苏玺鉴,孙久文.培育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重点方向和实践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24(1):126-133.
- [13] 蒲清平,向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77-85.
- [14] 钟茂初.“新质生产力”发展演进及其增长路径的理论阐释[J].河北学刊,2024(2):151-157.
- [15] 胡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及路径探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36-45+2.
- [16] 李晓华.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与形成机制[J].人民论坛,2023(21):15-17.
- [17] 赵振华.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体系[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3):1-14.
- [18]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6):12-22.
- [19] 王琴梅,杨军鸽.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3(6):61-72.
- [20] 张震宇.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 转型逻辑与实施路径[J]. 学术交流, 2024(1): 93-107.
- [21] 柳学信, 曹成梓, 孔晓旭. 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145-155.
- [22] 任保平. 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J]. 经济研究, 2024, 59(3): 12-19.
- [23] 贾康.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与体系: 以“创新”促“质变”[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24(4): 19-26.
- [24] 张辉, 唐琦. 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条件、方向及着力点[J]. 学习与探索, 2024(1): 82-91.
- [25] 李军鹏.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创新命题也是改革命题[J]. 人民论坛, 2024(6): 14-17.
- [26] 逢锦聚. 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需要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J]. 学术前沿, 2024(9): 5-12.
- [27] 张占斌.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东南学术, 2024(4): 1-10+246.
- [28] 蒲清平, 马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进路[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0(4): 1-10.
- [2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41.
- [31] 习近平.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J]. 求是, 2020(2): 4-11.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432.
- [3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63.
- [3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8.
- [35] 习近平.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 求是, 2019(1): 4-8.
- [3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75.
- [38]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创新型政府: 构建公共与私人部门共生共赢关系[M]. 李磊, 束东新, 程单剑,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75.
- [39]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中国式现代化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23[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3: 216.
- [4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102.
-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 第4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752-1753.
- [42]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 2024(11): 4-8.
- [4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87.
- [44] 施云燕. 基于全国调查的我国科研人员薪酬收入问题研究[J]. 今日科苑, 2022(3): 67-76.
- [45] 国家统计局. 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EB/OL]. (2024-05-17) [2024-07-19].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5/t20240520\\_1950434.html](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5/t20240520_1950434.html).
- [46] 习近平.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9.
-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 2023[EB/OL]. (2023-09-26) [2024-07-19]. <http://images.mofcom.gov.cn/wzs/202310/20231010105622259.pdf>.
- [48] 列宁. 列宁全集: 第5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83.
- [49]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N]. 人民日报, 2022-09-07(1).
- [50] 习近平.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8.
- [51] 蒲清平, 向往.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现实困境、实现机制与实践进路[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6): 15-26.

# Logic and Approach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A Stud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 Qing-ping , XIANG Wang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Summar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draws a new blueprint fo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and maintains the opinion tha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at fit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Productive forces, the fundamental motivator of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 the formation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while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can influence the status of productive forc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require new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an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abolishing outdated systems and mechanisms, and establishing new modes of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at can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inevitable choices that conform to objective regulations, draw on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CPC, and respond to practical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utilization of a problem-oriented thinking pattern, the exist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talent mechanism, market system,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opening-up mechanism conflic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makes it face significant fri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pgrad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deepen reform comprehensive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First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to strive for ke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that can transfer advanced driving forc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econdly, we should optimize the talent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alents in progressing the evolu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rdly, we should construct a high-standard market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market's capability of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urthly, we should update th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to encourage all the social members to exert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ifthly, we should establish a high-level opening-up mechanism to utilize favorab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ew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邓 菁)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4.09.001

[引用格式]蒲清平, 向往.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与进路——基于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与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9): 3-17.